

营商环境对外资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自贸区外资上市企业的实证

曾维新¹ 叶子² 温演驰²

(1. 资本市场学院教学研究部 广东深圳 518000; 2. 资本市场学院办公室 广东深圳 518000)

摘要: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对吸引外资企业和激发其内在创新动力、深化我国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改革意义重大。文章以自贸区所属省份外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营商环境对自贸区外资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营商环境能有效促进外资企业创新投入,这种影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较为明显;二是营商环境细分指标“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人文环境”均一定程度促进自贸区外资企业创新,其中市场环境和政务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基于研究结论,文章从营商环境细分指标出发,提出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启示,以期为我国深化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改革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 营商环境; 自由贸易试验区; 外资企业; 创新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 F273.1; F203.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24(2025)03-0086-11

DOI: 10.12181/jjgl.2025.03.07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规模稳步增长。外商投资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保障充分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积极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对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及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重要意义。营商环境是经营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不仅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跨国企业开展境外投资考虑的关键因素。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导致投资保护主义兴起,外商投资面临极大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聚焦加快推进形成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劳动力、土地、资金等引资传统资源和要素优势加速弱化,外资企业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严峻复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去,中国吸引外资主要靠优惠政策,现在要更多靠改善投资环境”。202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要求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外资,并对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提升投资经营便利化水平等提出明确要求。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背景下,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成为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的重要手段。自贸区作为我国高水平门户开放枢纽,自创设之初就是营商

收稿日期:2024-12-30

作者简介:曾维新(1990—),男,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经济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及科技创新;叶子(1990—),女,硕士,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和金融风险管理。

环境改革创新试验场和主阵地,为吸引和促进外资企业创新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自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设立以来,我国迄今已设立自贸区22个,为充分利用外资、促进外资企业创新发展,更好地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打下坚实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这为针对性优化自贸区营商环境,更好地促进外资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此背景下,研究营商环境对自贸区外资企业创新发展的影响,进而提出针对性措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将有助于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推动自贸区外资企业创新发展,助力自贸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成为对外开放高地。

二、文献述评

(一) 营商环境内涵及外延研究

“营商环境”是指企业自开办到注销全过程中所处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治环境、国际化环境等各种外部环境的总和^[1],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等众多领域^[2],包括完善的法律体系、透明的政策方针、高效的行政机构、自由的市场环境等^[3]。现有对营商环境的研究总体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市场环境。市场化水平越高,意味着政府的行政干预越少,各种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营商环境也相应更优^[4];东道国吸引外资的水平通常受限于自身的市场潜力,这种潜力既体现在资源、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也体现在以市场规模为特征的潜在优势;此外,货币稳定性与外资企业税率、原材料和能源价格、资金成本、产品价格、汇率风险等,也是在华外资企业关注的市场环境因素^[5]。二是政务环境。政务环境通常与行政效率挂钩,各种证件办理手续时长的缩减以及成本的压降,可以减轻企业的资金压力、节省人力资本,进而提升企业的资产周转效率和质量以及管理效能,促进外资企业发展^[6];通过提供高效的政务服务和便利的基础设施等可以提升政府行政效率,加之切实有效地保障外资企业的经营权益,有助于吸引外资和促进外资企业发展^[7]。三是法律政策环境。营商环境从本质上说是制度环境,它是投资者进行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8];良好的营商环境意味着适当的法律制度保障^[9];法律体系完善、司法流程简化,能够确保外资企业财产、知识产权得到有力保障,是构建良好营商环境的必要条件。四是人文环境;高水平人力资本和高强度科技投入对外资企业有着极强的吸引力;社会服务水平有效提升有助于促进当地外资企业发展^[6]。

(二) 营商环境对东道国吸引外资的影响研究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东道国增强对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的重要举措,也是外国投资者投资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10]。一方面,国内外部分学者研究表明,东道国营商环境和吸引外商投资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国外学者使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11];通过对世界银行营商便利度排名的研究,发现营商环境越完善,吸引外资能力越强^[12]。国内学者认为良好的营商环境、政府治理模式和水平与引进外资的规模成正相关关系^[3];发展中国家营商环境的改善和优化对追求效率提升类的外商直接投资有着明显的吸引力^[13]。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致力于研究营商环境具体因素和东道国外资吸引力之间的影响关系。国外学者认为企业注册、商业合同执行、财产登记和企业破产等手续办理耗时越短,越有利于东道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4];能够高效执行国际贸易规则并确保合同执行效力的国家,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具有明显优势^[9]。国内学者认为在华外资企业较为关注政务环

境、公共服务、金融服务以及人力资本等营商环境^[7]；外商投资企业对公平市场竞争环境较为敏感，因而东道国在产业方面的资本准入安排如果存在内资和外资差异的话，将不仅降低资源分配的效率，而且会减少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规模^[15]；相较于过去依靠要素优势和政策红利吸引外商投资和促进外资企业发展而言，营商环境优化和改善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可以为外资企业营造公正的法治环境和便利的生产经营环境，还可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和进行技术创新^[16]。自 2013 年上海自贸区首次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的外资准入制度以来，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不断缩减，行政审批随之简化，营商环境更自由、更透明、更开放，市场化程度和政府效率不断提升，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17]。

（三）营商环境对外资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目前，有关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对企业样本的选择也大多未区分资金来源。已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可以影响企业从事创新活动，如改善市场竞争环境、健全税收征管制度、增强法律执行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及减少官员腐败行为等^[18]；企业融资困难、资金不足会削弱创新的动机，完善的营商环境可以改善融资约束机制，同时降低贸易的交易成本，从而促使企业将更多资金用于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有正面影响^{[8][19]}。部分学者基于对我国跨国企业的长期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国内市场成熟度以及文化环境等因素对跨国企业的创新活动有影响，尤其是吸收能力较强的跨国企业在发达经济体市场上的创新活动和绩效表现更为优异^[20]；有学者进一步将营商环境细分为具体的环境要素考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政治关联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激进式的创新而非更为稳妥的渐进式创新，而且这种影响受到腐败行为的抑制^[21]。亦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认为改善营商环境降低了外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流程创新和产品创新的意愿，且平均边际效益依次增强；因此在通过营商环境优化吸引外商投资和促进外资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同时，要鼓励和支持外资企业着力提高人力资本素质，注重引入高水平的管理人才和技术创新人才，扭转因营商环境优化导致外资企业创新意愿降低的局面^[16]。

以上研究明确界定了营商环境的内涵和外延，论证了营商环境及其具体要素对东道国吸引外资的积极作用，具有较高的价值和借鉴意义，但并未系统论证营商环境对外资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影响外资企业创新的效果是否具有差异性。基于此，本文借鉴张三保等^[22]构建的省级营商环境指数，以自贸区所属省份外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回归模型实证营商环境对自贸区外资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效果及差异性。

三、研究设计及实证检验

（一）样本选择与变量定义

鉴于我国自贸区企业是一个相对概念，存在注册地、主营业务和自贸区占地面积不一致等情况，以及我国企业上市需经历较严格审核、上市企业在所属省份均较优秀且业务覆盖较广等实际，同时考虑样本数据完整性、可获性等因素，本文选取了自贸区所属省份 2017—2021 年外资持股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全部样本进行如下筛选和处理：剔除当年被标记 ST 的全部企业样本、剔除财务数据不全的企业样本、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水平的缩尾处理。样本企业数据来自万德数据库(Wind)。本文使用的变量界定如下(表 1)。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被解释变量	RDI	企业创新投入
解释变量	BE	营商环境

表 1 (续)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控制变量	Roe	净资产收益率
	Lev	资产负债率
	Cv	流动比率
	Br	企业商誉
	Size	企业规模
	Sub	企业收到的政府补贴
	Year	年度虚拟变量
	Ind	行业虚拟变量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投入(RDI)。虽然部分学者通过企业专利指标来衡量企业创新,但考虑到专利从申请到最终审批平均需要 2 年时间^[23],同时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只涵盖 2017—2021 年数据,本文将企业创新投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并通过企业研发投入金额与资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企业创新投入^[24-25]。

2. 解释变量

营商环境(BE)。本文参考相关学者做法,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建设要求,构建由 4 个一级指标、12 个二级指标和 29 个三级指标组成的省级营商环境指数^[22]作为解释变量。

3.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并在相关学者研究基础上^[23, 26-27]加入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企业规模、企业商誉和政府补贴等可能影响企业创新的控制变量。

(二) 模型构建

为检验营商环境优化对外资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本文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RDI_{i,t} = \alpha_0 + \beta_1 BE_{i,t,p} + \beta_2 Controls_{i,t} + \mu_i + \mu_t + \varepsilon_{i,t}$$

模型中的 $RDI_{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 i 在第 t 期的外资企业创新投入水平。 $BE_{i,t,p}$ 表示外资企业在 t 年 P 省所处的营商环境水平。 $Controls_{i,t}$ 是控制变量,表示企业的特征。此外,本文设置了 μ_i 和 μ_t 分别代表企业个体和年份变量,这些变量可排除企业自身特征和经济周期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干扰。 $\varepsilon_{i,t}$ 是残差项。

(三) 实证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分析表 2 可知,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外资企业创新投入的最大值为 0.39、最小值为 0、均值为 0.04、中位数为 0.03,均值大于中位数,说明少数创新投入较高的外资企业拉升了我国整体上市外资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解释变量营商环境的均值为 58.30、最大值为 72.79、最小值为 29.66,表明我国省级营商环境差异较大。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RDI	915	0.0400	0.0600	0	0.0300	0.390
BE	945	58.30	8.990	29.66	58.75	72.79
Roe	945	10.89	20.23	0	10.52	74.43
Lev	945	36.45	20.06	0	35.78	89.60

表 2 (续)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Cv	945	2.920	2.920	0	1.940	17
Br	915	0.0300	0.0700	0	0	0.450
Size	915	21.56	1.320	18.25	21.54	25.13
Sub	915	0.0100	0.0100	0	0	0.0500

从相关性分析结果(表 3)可以看出,自变量和因变量存在正向关系,且在 1% 水平上显著。初步可认为营商环境越好,外资企业创新投入越高。此外其他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小于 0.5,说明本文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3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Variables	RDI	BE	Roe	Lev	Cv	Br	Size	Sub
RDI	1.000							
BE	0.179***	1.000						
Roe	0.226***	0.022	1.000					
Lev	-0.119***	0.045	0.187***	1.000				
Cv	0.161***	0.020	-0.027	-0.546***	1.000			
Br	-0.093***	0.012	-0.169***	-0.029	-0.097***	1.000		
Size	-0.347***	-0.066*	-0.150***	0.273***	-0.201***	0.142***	1.000	
Sub	0.370***	-0.056*	0.212***	-0.183***	0.177***	-0.087**	-0.227***	1.000

说明: *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2. 基准回归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营商环境对外资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回归结果(表 4)显示,回归系数 0.008 46 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相关,说明营商环境对外资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上述结果可能的解释为营商环境优化在增强外资企业投资信心以及改善融资环境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特别是在缓解外资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信息不对称方面可以发挥信号作用,进而促进其加大创新投入。

表 4 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VARIABLES	RDI
BE	0.000846*** (0.000225)
Roe	0.000374** (0.000167)
Lev	8.22e-05 (0.000164)
Cv	0.00128 (0.000901)
Br	-0.00125 (0.0148)
Size	-0.00718*** (0.00182)
Sub	1.467*** (0.455)
企业	控制

表 4 (续)

VARIABLES	RDI
年份	控制
Constant	0.119*** (0.0381)
Observations	836
R-squared	0.271

说明: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下同)。

3. 异质性分析

(1)基于细化营商环境指数的异质性分析。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于 2023 年构建了“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并将营商环境细分为“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4 个子环境指数。为考察营商环境对外资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异质性,本文借鉴这一分类体系,将四类子环境指数与被解释变量 RDI 进行回归(表 5)。结果显示,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均对外资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市场环境和政务环境对外资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较大。上述结果可能的解释为,市场环境和政务环境与外资企业实际经营更密切相关,随着市场环境和政务环境改善,外资企业经营的效率和成本均可得到优化。因此,随着营商环境改善,外资企业对创新投入的水平也会提升。

表 5 细分营商环境异质性分类回归结果

VARIABLES	RDI	RDI	RDI	RDI	RDI
BE	0.000846*** (0.000225)				
市场环境		0.000598*** (0.000161)			
政务环境			0.000671*** (0.000195)		
法律政策环境				0.000435*** (0.000139)	
人文环境					0.000289** (0.000123)
Roe	0.000374** (0.000167)	0.000395** (0.000167)	0.000378** (0.000171)	0.000368** (0.000165)	0.000382** (0.000168)
Lev	8.22e-05 (0.000164)	0.000108 (0.000166)	8.95e-05 (0.000165)	8.38e-05 (0.000168)	0.000123 (0.000170)
Cv	0.00128 (0.000901)	0.00141 (0.000907)	0.00138 (0.000906)	0.00129 (0.000904)	0.00144 (0.000923)
Br	-0.00125 (0.0148)	0.00246 (0.0140)	-0.00210 (0.0156)	0.000640 (0.0157)	-0.00107 (0.0161)
Size	-0.00718*** (0.00182)	-0.00687*** (0.00186)	-0.00746*** (0.00182)	-0.00753*** (0.00182)	-0.00744*** (0.00183)
Sub	1.467*** (0.455)	1.472*** (0.469)	1.431*** (0.447)	1.422*** (0.443)	1.405*** (0.455)
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119*** (0.0381)	0.132*** (0.0384)	0.128*** (0.0384)	0.156*** (0.0357)	0.146*** (0.0377)
Observations	836	836	836	836	836
R-squared	0.271	0.262	0.263	0.256	0.245

(2)基于地域差异的异质性分析。所处地域不同可能导致营商环境对外资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产生差异。本文将自贸区所属省份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以此检验地域差异是否影响营商环境对外资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地域异质性分类回归结果(表 6)显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营商环境与外资企业创新投入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正相关,表明营商环境优化能有效提升东部和西部地区外资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但中部地区的营商环境与外资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关系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能的原因是中部的外资企业数量较少,因而未能在统计意义上展示出两者的关系。

表 6 地域异质性分类回归结果

	东部	中部	西部
VARIABLES	RDI	RDI	RDI
BE	0.000714** (0.000292)	-0.000393 (0.000548)	0.00105** (0.000441)
Roe	0.000450** (0.000213)	0.000505* (0.000260)	6.98e-05 (0.000204)
Lev	0.000149 (0.000195)	-5.67e-05 (0.000132)	-0.000194 (0.000264)
Cv	0.00152 (0.00106)	0.00339 (0.00234)	0.000663 (0.00108)
Br	0.00833 (0.0191)	-0.00200 (0.0176)	0.0198 (0.0387)
Size	-0.00724*** (0.00225)	-0.00401 (0.00292)	-0.00438** (0.00185)
Sub	1.526** (0.635)	1.628 (0.932)	1.167** (0.545)
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125*** (0.0475)	0.100 (0.0654)	0.0548 (0.0444)
Observations	695	62	79
R-squared	0.235	0.676	0.548

(四)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可靠性和一致性,本文在剔除一线省份后重新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28]。结果显示,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投入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正相关(表 7),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表明本文实证研究结果稳健可靠。

表 7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VARIABLES	RDI
BE	0.000779*** (0.000238)
Roe	0.000526*** (0.000187)
Lev	-4.92e-05 (0.000140)
Cv	0.00120 (0.000860)
Br	-0.0185 (0.0139)

表 7 (续)

VARIABLES	RDI
Size	−0.00624*** (0.00164)
Sub	1.614*** (0.400)
企业	控制
省份	控制
Constant	0.104*** (0.0317)
Observations	470
R-squared	0.423

（五）内生性检验

一方面,有关营商环境的政策和措施(包括简政放权、税收优惠、市场监管改革等)通常是基于区域或行业整体发展需求而设计的,并非针对特定企业。另一方面,营商环境政策形成的周期较长,而企业创新行为可随时发生,通常政策制定在前,企业在获悉政策之后会有所响应。基于研究的严谨性,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将营商环境指数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形成 BE_1 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BE_1 回归结果仍然显著为正,表明滞后一期的营商环境指数对外资企业的创新投入仍具有正向影响。

表 8 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

VARIABLES	RDI
BE_1	0.000770*** (0.000211)
roe	0.000302* (0.000170)
Lev	4.73e-05 (0.000185)
Cv	0.00108 (0.000879)
Br	−0.00202 (0.0151)
size	−0.00585*** (0.00184)
sub	1.623*** (0.465)
2019.year	0.000401 (0.00314)
2020.year	−0.00726*** (0.00272)
2021.year	−0.00225 (0.00296)
Constant	0.0953*** (0.0359)
Observations	650
R-squared	0.280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 实证研究结论

第一,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营商环境可以显著影响外资企业的创新投入。第二,基于营商环境4个子环境指数的回归结果表明,市场环境和政务环境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作用相较于法律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更为显著。第三,通过地域划分样本回归发现,外资企业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营商环境变化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影响;而在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明显。

(二) 政策启示

通过营商环境对自贸区外资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可以发现,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人文环境,特别是重点优化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将有助于促进外资企业加大创新投入,这将为深化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改革提供重要思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相关精神,结合实际,下一步或可在以下四方面持续发力,以助力自贸区营造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持续吸引外商投资并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支撑自贸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1. 持续优化市场环境,形成公开平等的竞争氛围

一是促进公平竞争。深入贯彻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坚持“非禁即入”原则,特别是在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放宽自贸区外资进入的限制,同时在自贸区开展放宽科技创新领域外商投资准入试点;加大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查处力度,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方面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确保外资企业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参与标准制定和享受产业政策。二是提升信息透明度。建立健全自贸区外资企业信息披露制度,提升企业经营透明度;加强与外资企业的互动交流,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及时响应并解决外资企业的正常诉求和问题。三是优化资源配置。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壁垒,支持外资企业在自贸区设立研发中心和总部机构,推动资源要素自由流动,鼓励自贸区外资企业参与国家部分非敏感重大战略项目和布局新兴产业。四是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鼓励自贸区外资企业与我过本土企业建立紧密的产业链合作关系,促进技术共享和协同创新;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推动外资企业在自贸区形成产业集群,提升整体竞争力。

2. 持续优化政务环境,提供高效廉洁的公共服务

一是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深化自贸区“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简化外资项目审批流程,减少审批环节和时间,提高审批效率;推动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实现线上线下融合,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降低外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改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自贸区政务服务体系,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为外资企业提供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建立外资企业服务专班或“服务大使”制度,为企业提供定制化、个性化服务;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企业投诉跨部门协调工作机制,确保企业诉求得到及时解决;优化签证政策,放宽签证入境有效期,为外籍人员来华工作、学习、旅游提供便利;优化行政审批,采取“一口受理、并联审批”等方式,为外籍人员来华工作快捷办理工作许可及工作类居留许可。三是加强公共政策宣传。通过主动上门宣讲、举办政策培训班和研讨会等方式,加强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相关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帮助自贸区外资企业及时获取政策资讯及更好地理解运用政策;建立健全政策落实跟踪评估机制,及时发现并纠正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和问题。

3. 持续优化法律政策,塑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

一是完善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根据自贸区建设情况及各自发展特点,结合国内外最新发展形势,有步骤、有计划、系统性地制定自贸区的政策体系,建立规范高效的治理体制机制;加快制定和完善与外商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确保外资企业在法律框架内平等竞争;加强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为外资企业提

供专业、高效的法律服务;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聚焦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等领域,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二是健全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自贸区外资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尽快形成制度性保障;加快推进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平台建设,同时加强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与交流,推动完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机制,保护外资企业创新成果不受侵犯。三是不断优化和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对自贸区外资企业在我国境内再投资且属于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之内的重大项目,给予优惠税收政策,进一步减轻外资企业税收负担;提高税收征管质效,提供便捷的税收服务,降低企业税收成本,提高税收遵从度。

4. 持续优化人文环境,营造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

一是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积极搭建文化交流和商务合作平台,在文化、学术、商务等各领域举办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增进自贸区外资企业与政府、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本土企业和公众之间的了解与合作,为外资企业壮大业务、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二是强化人才发展保障。建立健全自贸区外资企业人才服务体系和激励机制,对负责引进和培养外籍人才的相关机构适当予以物质奖励、人才住房配套政策倾斜等保障;提供更多更丰富的国际化教育培训服务,为外籍人才成长发展创造条件;建立外籍来华工作人员高层次人才认定及服务保障机制,获得认定人员在公共服务、个人所得税等方面给予适当优待,允许我国部分紧缺专业外籍高层次人才享受国民同等待遇。三是营造宜居宜业环境。加强自贸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公共服务配套水平,为外资企业员工提供良好的生活配套服务;加强中外基础教育合作,为自贸区外籍来华工作人员子女受教育提供便利。

参考文献:

- [1] 马相东,王跃生.新时代吸引外资新方略:从招商政策优惠到营商环境优化[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22(4):112-121.
- [2] 宋林霖,何成祥.优化营商环境视阈下放管服改革的逻辑与推进路径——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8(4):67-72.
- [3] 张梁梁.政府治理与FDI进入模式:以社会资本为调节变量[J].世界经济研究,2018(7):68-79.
- [4] 李佳,张鹏宇.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性差异研究——基于宏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7):146-149.
- [5] 周向雯.营商环境视角下外资企业市场退出机理及其异质性研究——对896家在华外资企业的问卷调查与实证[J].产经评论,2020,11(5):42-60.
- [6] 李若曦,刘钧霆.营商环境对粤港澳大湾区利用外资的影响[J].企业经济,2019,38(12):154-160.
- [7] 蔡晓珊.粤港澳大湾区营商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22,38(12):101-114.
- [8] 苏冷然.营商环境国际化:理论基础、实践差距与应对[J].当代经济管理,2021,43(3):9-16.
- [9] CONTRACTOR F J, DANGOL R, NURUZZAMAN N, et al. How do country regulations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imp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flow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20, 29(2): 101640.
- [10] BEVAN A A, ESTRIN S.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o European transition economie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4, 32(4): 775-787.
- [11] HADJILA KRIFA-SCHNEIDER, IULIANA MATEI. Business climate, political risk and FDI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0, 2(5): 54-65.
- [12] CORCORAN A., GILLANDERS 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ease of doing business[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5, 151(1): 103-126.
- [13] 刘军,王长春.优化营商环境与外资企业FDI动机——市场寻求抑或效率寻求[J].财贸经济,2020,41(1):65-79.
- [14] AZMAT G, ALMUKHTAR S A. Indicator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 countrie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013, 27(4): 515-530.
- [15] 朱健,任荣明.东道国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议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J].世界经济研究,2018(3):109-126,136-137.
- [16] 靳婷婷,刘军.人力资本、营商环境优化与外资企业创新——兼论引智的重要性[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1(5):70-80.

- [17] 刘春艳, 赵军. 营商环境优化对 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准自然实验[J]. 经济体制改革, 2022(3): 70 – 76.
- [18] CHADEE D, ROXAS B.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Russia[J].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2013, 9(1/2): 19 – 39.
- [19] 王欢, 黄胜强. 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营商环境与出口产品质量[J].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24, 31(2): 40 – 55.
- [20] WU J, MA Z Z, LIU Z Y, et al. A Contingent view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irm capabil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merg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9(82): 148 – 157.
- [21] KRAMMER S M S, JIMÉNEZ A. Do political connections matter for firm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emerging markets in Central Asia and Eastern Europe[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0, 151: 1 – 12.
- [22] 张三保, 游濯沉. 中国内地省份政务营商环境评估与动态比较[J]. 长江论坛, 2024(1): 53 – 60.
- [23] 曹越, 彭可人, 郭天泉. 增值税税率调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3(2): 214 – 224.
- [24] 庄旭东, 段军山. 打通产业创新“最后一公里”: 政府支持与成果转化——以高技术产业为例[J]. 工业技术经济, 2021, 40(6): 19 – 27.
- [25] 李全, 李姿璇, 樊铁侠. 重点产业政策、金融化与企业创新投入[J]. 南开经济研究, 2024(3): 181 – 198.
- [26] ALLEN A, LEWIS-WESTERN M F, VALENTINE K. The innovation and reporting consequences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for young life-cycle firm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22, 60(1): 45 – 95.
- [27] MILLER B P, SHENEMAN A G, WILLIAMS B M. The impact of control systems on corporate innovation[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22, 39(2): 1425 – 1454.
- [28] 王文华, 何杭娟, 钟海连. 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创新文化的中介效应[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23, 39(4): 97 – 108.

How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fluence the Innovation Input of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

——Evidence from Listed Firms in Free Trade Zones

Zeng Weixin¹ Ye Zi² Wen Yanchi²

(1. China Capital Market Institu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ing, 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 China;

2. China Capital Market Institute office, 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 China)

Abstract: Creating a world-class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crucial for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stimulating innovation among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advancing reforms in China's foreign investment management system.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the innovation input of foreign-funded listed enterprises located in China's Free Trade Zon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A favorable business environment significantly enhances innovation input among foreign enterprises, with stronger effects observed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2) Key dimensions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namely, the market environment, government environment, legal and policy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all positively influence innovation. Among these, the market and government environments have the most pronounced impac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paper offer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cused on improving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providing valuable guidance for deepening reforms in China's foreign investment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 business environment; free trade experiment zone;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innovative system reform

[编校: 刘书亮]